



FDS

Frontiers of Discourse Studies

FDS, Vol. 1, No. 1, 2026, pp. 118-125.

Print ISSN: 3106-809X; Online ISSN: 3106-810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ds260110wcprg>



女性与气候：格里塔·加德的气候正义批评实践

汪雅雪 (Wang Yaxue)

摘要：格里塔·加德的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以其包容性与交叠性为显著特征，其中她对气候正义的批判性实践研究尤其值得关注。加德指出，当前女性主义在气候正义伦理方面的探讨尚未充分展开，尤其是在挑战那些忽视性别、性取向、物种及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分配模式上仍有不足。基于对历史上女性主义气候正义行动的分析，她进一步强调，女性确实是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之一，而既定的性别角色往往阻碍了妇女有效参与气候决策的制定过程。为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气候正义，加德主张必须引入女性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双重视角，对现有理论与政策进行分析与补充。

关键词：女性主义；气候正义；包容性；后人文主义

作者简介：汪雅雪，讲师，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邮：yukiwwz@163.com

Title: Women and Climate—Practical Research on Greta Gaard's Climate Justice Criticism

Abstract: Greta Gaard's critical ecofeminist though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inclusivity and intersectionality, with her critical practice research on climate justice being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Gaard points out that current feminist discussions on the ethics of climate justice remain underdeveloped, especially in challenging distribution models that overlook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speci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analyzing historical feminist climate justice actions, she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women are indeed among the groups most severely impact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while established gender roles often hinder women'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climat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o achieve more inclusive climate justice, Gaard advocat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both feminist and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and supplement existing theories and policies.

Key Words: Feminism; Climate justice; Inclusiveness; Post-humanism

Author Biography: Wang Yaxue, Lecturer, Anhui Business College.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yukiwz@163.com

格里塔·加德 (Greta Gaard)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生态女性主义作家和活动家, 她的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寻求将生态女性主义、动物研究、气候正义、后人文主义等结合起来, 并且一直笔耕不辍地进行研究, 迄今为止发表相关论文53篇以及7本专著 (其中独著4本, 合著3本), 俨然成为当代生态女性主义领域的开拓者和代表者。

一、气候正义研究述评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活动特别是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成为当今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温室气体, 全球变暖正在引起急剧的气候变化。在经济高速发展之时, 环境正义运动也在随之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 气候危机逐渐被视为一个环境正义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虽然没有使用‘气候正义’这一概念, 但是提出了两条重要的气候正义原则, 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历史责任原则。”(杨勇进, 2023, p. 1)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 《巴黎协定》(2015)正式使用了“气候正义”一词, 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气候正义理念, 将更多的伦理关切纳入了气候正义的考量范围。简言之, 气候正义是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过程和所有方面公平地对待所有实体和个人的价值体系, 它是被作为一个价值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综合概念来理解的。“《巴黎协定》不仅正式使用了‘气候正义’一词, 而且还把性别平等、代际平等、人权、健康权、发展权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纳入了气候正义的考量范围, 使气候正义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杨勇进, 2022, p.79)西方学术界不仅梳理了气候正义这一概念的内涵与主题, 并且还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 厘清了气候正义所涉及的主要伦理问题。相比较西方, 国内对于气候正义的研究起步较晚。以知网为例, 以“气候正义”为主题进行搜索, 截止到2025年10月10日, 相关论文达到339篇, 其中史军的论文成果数量最多。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气候正义行动历史回顾

虽然198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 通过印度农民妇女保护树木 (她们的生计)运动的新闻, 介绍了妇女保护环境的“第一次行动”, 但1991年11月, 妇女在保护地球方面的作用才得到了明确阐述。同年, 由美国前国会议员贝拉·艾布扎格 (Bella Abzug)和女性主义活动家兼记者米姆·凯尔伯 (Mim Kelber)成立了全球性倡导组织——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 (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简写成WEDO, 以下简称妇女环发组织)。该组织一直是引领妇女参加国际会议和行动的倡导者, 在国际妇女权利运动中赢得了开拓者的声誉。1992年, 妇女环发组织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了世界妇女促进健康地球大会。世界妇女大会 (World Women's Congress)被视为一个重要平台, 旨在承继过去十年联合国在妇女与环境保护领域的成果, 并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

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简写成UNCED, 以下简称“环发会议”)制定妇女行动议程。此次大会汇聚了来自83个国家的逾1500名妇女代表, 最终形成了《妇女21世纪议程》。尽管该议程是通过共识机制构建的, 但在修辞层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例如, 尽管众多国家的女性领导人作为环发会议的关键参与者和决策者出席, 多数发言仍侧重于强调妇女基于性别的传统角色, 未能充分突破既有的性别论述框架。尽管如此, 《妇女21世纪议程》仍被视为女性主义观点正式进入联合国全球环境议程的关键切入点, 为后续将女性主义视角与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相结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妇女21世纪议程》发表后的二十年里, 女性主义者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程度从1980至1990年代侧重于“妇女、环境与发展”(wome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简写成WED)、“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 简写成WID)或“性别、环境与发展”(gende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简写成GED)发展到1990至2000年代侧重于女性主义政治生态。最初, 关于妇女与环境的讨论集中于全球南方的妇女, 她们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用地、森林资源、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实际物质需求超过了关于性别化环境论述的更具结构性的讨论。加德认为, 对妇女而不是性别的关注倾向于将妇女视为需要救援的环境退化受害者: 他们通过家庭护理和生存劳动培养与自然的亲近, 这种与自然的天然亲近被认为为妇女提供了特殊知识, 并且她们在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中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被认可。显然, 这种修辞将女性工具化, 忽视了女性与自然联系的文化局限性, 它对男性的角色以及性别作为一种制度的方式保持沉默, 这种制度构建了产生“受害者”的经济和物质资源。向“女性主义政治生态”的转变, 意味着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在宏观层面解构全球化进程中的殖民性遗产; 在微观层面剖析地方机构对环境资源的管控机制; 进而批判如婚姻等社会制度如何规训女性对自然资源的获取; 并从根本上质疑空间如何通过女性的流动性、劳动、知识与权力关系被性别化。这一分析路径标志着从聚焦“女性”个体, 转向审视作为社会权力关系构成的“性别”, 是女性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进展。

针对主流观点多从环境科技角度分析并解决气候变化的局限, 加德提供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她将气候变化归因于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过度消费, 并指出依赖同源技术手段的解决方案存在本质缺陷。同时, 她揭示了女性在该议题上面临的双重不公: 在政策话语中被系统性排斥, 却在现实中首当其冲地承受气候冲击。受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女性全球领导力中心 (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 的创始人、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学者夏洛特·邦奇 (Charlotte Bunch) 的启发, 加德探究了“女性与气候变化的问题本质是什么? 如何起源的? 我们想要什么? 以及我们如何达到该目标?” (Bunch, 1987, p.3)

三、气候变化、环境气候科学和女性主义的问题本质

自工业革命 (约1760-1840年) 以来, 化石燃料的燃烧推动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的持续上升, 导致全球气温飙升, 进而引发海平面上升、冰川退缩、极端天气频发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与此同时, 女性在全球范围内承受着显著的社会经济不公: 她们承担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长, 生产了半数粮食, 却仅获得10%的收入, 且在全球最贫困的10亿人口中占比高达70%。这些数据由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组织持续引用, 表明女性构成了世界上经济回报最低的群体。性别结构性不平等将妇女和儿童置于气候危机与贫困的前线。全球性的性别角色不仅限制了妇

女的流动性并将其束缚于生产和照料劳动，更将她们排除在气候决策之外。在发展中国家，当男性因农村生态恶化外迁后，妇女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承担了加剧的农务与家庭责任，使其在面对气候灾害时极为脆弱。研究表明，性别不平等导致妇女与儿童在生态灾难中的死亡风险成倍高于男性。加德从三个层面解释了此现象：在灾前，妇女因忙于家务而难以获取预警信息，且缺乏游泳等逃生技能的训练；在灾中，她们的逃生行动因需要携带婴儿和协助长者而严重受限，其丈夫则常独自脱险；在灾后，母亲的大量丧生又会引发婴儿死亡率攀升、女童被迫早育与失学，以及性剥削和人口贩运加剧等次级灾难，幸存的妇女自身也面临更高的性侵犯威胁。例如，卡特里娜飓风后，“数十名幸存者报告了强奸事件，并在新闻报道中提及，但没有讨论将强奸支助队纳入救援小组，也没有提到本应向被强奸妇女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Seager, 2006, p.2-3)

加德明确指出，女性在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中承受的过度影响，其根源并非生理性的，而是由社会性别角色、系统性歧视与贫困所共同导致的结构性不公。普遍来看，从环境气候科学（即天体物理学、大气化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古气候学）的角度来描述，“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需要技术和科学解决方案的科学问题得到了最广泛的讨论，没有实质上的变换统治、剥削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这种对气候变化根源的歪曲是问题的一部分，误导了那些将气候变解决方案建立在不完整分析基础上的人。”(Klein, 2014, p.127)加德批判了主流气候论述中将问题窄化为纯科学与技术议题的倾向，认为这种“祛性别化”的框架掩盖了其背后统治、剥削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结构，并由此误导了解决方案的制定方向。在最高级别的国际讨论中，“气候变化被视为一场人类危机，性别与此无关”(MacGregor, 2010, p.225)，而“人类 (man)”应该是指每个人，这在无形中抹杀了性别差异。这种视角直接导致与女性经验密切相关的数据与观点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使妇女传统上围绕环境健康、生计与栖息地形成的实践知识被边缘化，让位于占据中心舞台的技术解决方案。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机构已承认妇女兼具脆弱性、能动性与关键作用，但加德强调，要实现其潜力，必须首先确保女性在气候政策制定中享有平等席位。她最终主张，真正的包容性生态女性主义必须与气候正义运动相结合，并倚重所有妇女作为基层力量的独特价值。

四、质问问题出现的原因——生态女性主义的反驳

面对环境危机，主流叙事常将责任指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却忽视了更为根本的驱动因素——第一世界的过度消费。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必须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呼吁对它们进行双重削减。世界观察研究所 (WorldWatch Institute)自1974年成立以来所倡导的人口策略，正体现了这种关联性思考。该策略通过三方面路径赋能妇女：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壁垒；优先保障女童与妇女的受教育权；以及确保生殖健康服务的普及与自主选择，最终使生育决策权回归家庭。¹加德提出，虽然这三项战略似乎具有全球相关性，但“该报告没有对计划生育目标——妇女群体进行访谈，以了解这一战略是否是她们希望或能够实施的，显示出一种‘父亲最了解’的应对人口和气候科学方法。”(Gaard, 2017, p.127)

当第一世界的过度消费者意识到自身行为已对边缘社群造成严重气候冲击，并可能引发难民危机与大规模气候移民时，减少第三世界人口的主张便再度浮现。其支持者认为，由于全球三分之二

¹ 该论点出自世界研究所记者 Robert Engelman 的报告，具体参见“Popul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Women’s Lives.”*WorldWatch Report#183*.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2010

的人口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严重的气候影响, 并可能向发达国家迁徙, 因此在贫困社区推行计划生育被视为降低碳排放的有效手段。然而, 这种将人口过剩指认为环境危机根源的论述, 遭到了女性主义的强烈抵制。

女性主义者批判道, 这种人口论调是一种精英主义修辞, 它转移了人们对性别、性向及物种间正义等更为根本的交叉性问题的注意力。她们指出, 气候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生殖危机: 对部分女性而言, 气候风险剥夺了其生育选择的自由; 对另一部分女性而言, 化石燃料工业已直接危及她们自身或后代的生殖健康。因此, 女性主义者主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 致力于确认气候正义与生殖正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而非将问题简单归咎于人口数量。加德说道: “气候正义、粮食安全、能源正义、野生动物消失、发展不良、栖息地丧失、工业化动物食品生产等全球危机同时具有社会和生态层面特征, 需要生态女性主义分析。” (Garrod, 2011, p.32)在此基础上, 加德强调必须对气候变化论述中有关“人口过剩”的指责作出有力回应。她指出, 生态女性主义者可从两个理论分支展开反驳: 其一是物质女性主义。该理论由斯黛西·艾莱默 (Stacy Alaimo)与苏珊·贺克曼 (Susan Hekman)于2008年提出, “通过重新解读自然与身体的定义, 物质女性主义改变女性和自然被置于二元论中低等的、被剥削的地位, 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和自然, 具有生态的意识, 也拓展了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发展新方向。” (王微微, 2020, p.91)加德进一步指出, 物质女性主义的观点在更早的实践与研究中已现端倪。早在20世纪70年代, 女性主义健康倡导者便开始质疑科学界普遍以男性样本代表全体的研究范式, 转而关注环境对妇女与儿童健康产生的具体影响。她们通过实证研究, 揭示了环境污染与乳腺癌、哮喘、铅中毒、生殖障碍及其他类型癌症之间的关联。同一时期,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也已阐明环境化学物质对鸟类、其他动物物种及生态系统造成的不良效应; 后续的女性主义环保主义者则进一步揭露了从杀虫剂、塑料至油漆与睡衣等多种合成化学物质, 与人类及非人类动物内分泌系统紊乱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些由女性主义推动的健康与环境研究, 不仅为环境正义运动奠定了科学基础, 也为物质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与经验支撑。

针对精英阶层将环境危机归因于“人口过剩”的论述, 加德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可借助的另一重要理论分支为女性主义动物研究。该研究脉络最早可追溯至1966年, 女性主义批评家已尝试以动物生态女性主义挑战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加德主张, 一切形式的压迫——尤其是针对非人类动物的压迫——均具有结构性关联, 须被整体根除。因此, 解放的目标不仅在于终结对环境的支配, 更须废除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系统性统治。学者进一步指出, 西方工业化动物生产体系本质上建立在对“雌性”生命的双重剥削之上: 既伤害作为繁殖工具的动物身体, 也危及消费其肉类的人类女性健康。正如研究所揭示: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雌性动物——小鸡、奶牛、火鸡、猪和其他动物——它们的生育能力经常被操纵, 它们的后代被商品化, 成为工业化动物食品生产的产品, 它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Garrod, 2010, p.104)具体表现为: 笼养鸡只被密集囚禁于狭小空间, 依赖抗生素以最大化其繁殖与产蛋能力; 奶牛被强制受精, 其雄性幼犊在出生后数小时内即被分离, 并在限制条件下饲养至宰杀。加德及其他女性主义动物研究学者将此类跨物种的生殖剥削视为殖民主义与技术科学世界观的延续, 指出工业化动物生产不仅是生殖正义、跨物种正义与环境正义的多重失败, 亦构成严峻的气候正义问题。该体系导致农田被大量转为饲料种植, 森林遭牧场取代, 水资源被过度消耗; 其

废弃物——包括农药、激素、抗生素及屠宰副产品——持续污染湿地与荒野。畜牧业不仅显著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也削弱了森林等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从而加剧气候系统的整体失衡。

人类健康亦受到这一体系的显著影响。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肉类消费长期与繁荣、健康形象及社会地位相绑定。随着更多国家效仿此类饮食模式，其癌症、心脏病、肥胖等与动物食品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也相应上升。当前，全球粮食产量足以供养约120亿人口，然而仍有超过九亿人处于饥饿之中。因此，加德指出，正如粮食与发展学者数十年来所争论的：问题并非人口过剩，而是粮食分配的系统性失衡及精英阶层对粮食资源的控制。

综上所述，加德强调，世界饥饿、粮食生产、性别与物种歧视等一系列问题，均与气候变化的根源密切相关。将人口过剩指认为气候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导；相反，气候变化本质上是由工业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所驱动，并在性别、种族与物种等多重不公正的结构中持续加剧。

五、我们如何解决问题——更具包容性的气候正义

2002年制定的《巴厘气候正义原则》涵盖了性别、原住民、年龄、能力、财富与健康等多重维度，倡导在能源与粮食生产可持续性、民主决策、生态经济学、性别公正及经济赔偿等方面采取行动，尤其强调支持对全球最脆弱群体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保护。尽管《巴厘原则》承认地球母亲的神圣性、生态整体性及各物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加德指出，其整体框架并未引入后人文主义的视角。加德认为，气候正义不仅需要正视妇女权利问题，反对将自然及其资源商品化，还应进一步抵制将动物身体与女性身体同时作为商品的跨物种剥削行为。为增强其包容性，《巴厘原则》有必要引入融合女性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正义观。

此处有必要对“后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稍作阐释：后人文主义源于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其核心主张包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评估人类理性与能力的局限，并重视非人类实体的内在价值。该理论强调物种间的共生关系，试图解构人类作为万物尺度的固有认知，并提出新的世界观与伦理体系。在这一意义上，后人文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理性至上主义的批判，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诉求高度契合。2013年11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华沙）期间，一场关于性别平衡的研讨会首次系统披露了妇女在气候决策中长期被边缘化的事实。从《妇女21世纪议程》到此次会议，历经二十余年，这一进程既揭示了气候变化分析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特征，也反映了女性在争取气候事务自主权方面的持续努力。

但是，加德进一步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使女性全面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讨论，是否必然意味着女性主义观点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她质疑，女性代表的增加是否真能转化为更具性别敏感度的气候政策，以及在气候变化认知与关切层面，是否存在系统性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在气候问题及相关决策岗位上，女性常展现出与男性不同的行为模式与优先关切。然而，当前女性在气候变化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依然严重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削弱了政策的多元性与公正性，更在实质上阻碍了国家及全球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效能。

六、如何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气候正义？——走向女性主义、后人文主义的气候正义

为将女性主义与后人文主义政治主张融入《巴厘原则》的实践，需同时采取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变革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策略。这意味着责任不仅存在于系统层面，要求国家与企业调整相关政

策，也延伸至个体层面，有赖于公民与消费者行为的相应转变。尽管技术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加德提出了更具深度的解决路径。她主张，唯有在经济学领域引入女性主义气候正义视角，才能触及气候危机的结构性根源。该方法强调从公民个体到企业组织等各个层面共同推动公平与可持续性，从而构建系统性的气候治理范式。

加德援引了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玛丽莲·沃林 (Marilyn Waring) 的经典研究，后者深刻揭示了主流国民账户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该体系既无法核算自然本身的生产与消耗，也系统性忽视了主要由妇女承担的无酬劳动。例如，一个提供清洁水源的湖泊，其生态价值在遭受污染前在国民经济账户中为零；直到企业支付 (通常由男性执行的) 清理费用时，这项活动才被记录为经济增长。同样，一片维持社区生计的森林，其价值仅在树木被砍伐并制成商品后才得以体现，与之相关的 (通常由男性主导的) 工业活动则被计入收入。基于此批判，加德主张，要实现真正包容的气候正义，必须建立一套融合后人文主义与女性主义视角的生态会计系统，以便在从地方到全球的各个层面，有效追踪并推动符合气候正义的经济实践。

加德进一步主张，必须以全球经济正义取代现行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后者在实践中常表现为全球公司化以及对本土生态的殖民。她认为，这才是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性回应。依据《巴厘原则》的精神，工业化国家必须偿还其历史排放所累积的“气候债务”，并建立新的经济核算体系，确保不再将环境与社会成本转嫁给脆弱的社区与生态系统。尽管地方层面的社区行动 (如在经济、能源与治理领域的实践) 为替代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微观范式，但它们仍可能受制于跨国资本、贸易协定及军事压力等宏观力量的支配。因此，加德提出双重战略：一方面，应从支配性的全球经济机构中撤出支持，转而投资于奉行社会、环境与气候正义的制度；另一方面，必须向国际治理机构持续施压，要求其内部实现决策权的公平分配。

正如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在二十多年前所倡导的，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宏观层面的性别平衡至关重要。女性主义气候正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关于“性别与气候”的讨论往往存在单一化倾向，仅聚焦于女性角色。实际上，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全球范围内男性如何在这一议题中受到不同影响或从中获益。同时，必须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性别角色进行系统性考察，分析这些社会建构如何助长了过度消费模式、性暴力行为，以及在气候危机期间抛弃家庭成员的现象，并探究其如何共同导致妇女在地方、国家及全球决策机构中被边缘化。加德强调，当前正是需要重新发掘和构建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生态男性气质”的关键时刻，这将为迈向气候正义的必要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女性主义学者常援引“交叉性”概念，通过分析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维度，以揭示权力、特权与压迫的复杂运作机制。然而，加德指出，这一分析框架鲜少从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将物种与生态系统纳入“交叉性身份”的考量范畴。对此，生态女性主义者曾提出“政治动物”这一概念，旨在重构第一世界生态公民的自我认同，它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并关注系统内部的流动平衡与个体福祉。基于此，加德最终主张，一种融合了后人文主义视野的生态女性主义，必须将对人类身份的哲学反思，与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在气候变化中角色的生态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她强调，这一综合性的理论路径应在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

七、结语

综上所述,加德通过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历史回溯指出,其根源在于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第一世界过度消费,而这一体系内生的科学技术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为此,她主张必须以女性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气候正义视角,从地方、国家到全球层面,系统性地干预并重塑当前的气候变化分析与解决方案。加德的论述最终表明,唯有引入批判性的后人文生态女性主义分析框架,才能真正理解女性与气候变化的深刻关联,进而实现一种具有包容性与变革性的气候正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 2023 年安徽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格里塔·加德的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研究 (编号: 2023AH05229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ang Yaxu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1002-2384>

References

- Bunch, Charlotte. (1987). *Passionate Politics: Feminist Theory in Action*. St. Martin's Press.
- Gaard, Greta. (2017). *Critical Ecofeminism*. Lexington Books.
- Gaard, Greta. (2011). Ecofeminism Revisited: Rejecting Essentialism and Re-Placing Species in a Material Feminist Environmentalism. *Feminist Formations*, 23(2), 26–53. <https://doi.org/10.1353/ff.2011.0017>
- Gaard, Greta. (2010).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or Reproductive Justice? An Ecofeminist, Environmental Justice Perspective on the Rhetoric of Choice. *Ethics & the Environment*, 15(2), 103–129. <https://doi.org/10.2979/ete.2010.15.2.103>
- Klein, Naomi. (2014).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Simon & Schuster.
- MacGregor, Sherilyn. (2010).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From Impacts to Discourses.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6(2), 223–238. <https://doi.org/10.1080/19480881.2010.536669>
- Seager, Joni. (2006). Noticing gender (or not) in disasters. *Geoforum*, 37, 2–3.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05.10.004>
- 王薇薇.(2020).物质女性主义研究[J].语言教育,8(02):86-91+97.
- [Wang, W. W. (2020). Research on material feminism. *Language Education*, 8(2), 86–91, 97.]
- 杨通进,李玉香.(2023).近 30 年国内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展望[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3(02):1-16.
- [Yang, T. J., & Li, Y. X. (2023). Three stages and prospects of domestic climate justice research in the past 30 years. *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3(2), 1–16.]
- 杨通进.(2022).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焦点问题[J].伦理学研究,(01):79-91.
- [Yang, T. J. (2022). Three focal issues in climate justice research. *Studies in Ethics*, (1), 79–91.]